

韩国小说《素食主义者》中的家庭暴力与伦理反思

Ethical Introspection on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Vegetarian*

池水涌 (Chi Shuiyong)

内容摘要：《素食主义者》是由韩国当代女作家韩江创作的系列小说。小说以三种不同的视角描述了主人公英惠及其身边亲人的痛苦经历和悲剧命运。他们的痛苦经历和悲剧命运来自于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的暴力。在现实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伦理秩序和伦理观念之中。因此，人的暴力往往隐藏在社会的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之中，通过伦理冲突或伦理选择显现出来。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聚焦现代韩国家庭中的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诠释由此引发的亲人之间的家庭暴力，并对家庭暴力环境下人物的伦理选择与伦理悲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韩江；《素食主义者》；家庭暴力；伦理反思

作者简介：池水涌，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韩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本文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海外韩国学培育项目“中国华中地区韩国学核心基地培育项目”【项目编号：AKS-2016-INC-223000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文学基本理论跨学科研究”【项目编号：2020FZA11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Introspection on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Vegetarian*

Abstract: *The Vegetarian* is a serial novel written by Han Kang, who is a modern Korean female writer. With *Yeong-hye being the heroine*, *The Vegetarian* narrates the miserable and tragic life of *her and her family members*. Their painful experiences are caused by human violence pervasive in daily life. Ethical order and ethical ideas penetrate human life and violence is usually hidden in the ethical order and ethical ideas; violence demonstrates itself through ethical conflicts or choices. *The Vegetarian* focuses on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order and ethical ideas of modern Korean families. It illustrates the hidden domestic violence between the family members. To this end, it has introspected the ethical choices and ethical tragedy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in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violence.

Key words: Han kang; *The Vegetarian*; ethic; violence; introspection;

Author: Dr. Chi Shuiyo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specializing in Kore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chishuiyong@163.com).

《素食主义者》是由韩国当代女作家韩江创作的系列小说。该作品获得了2016年度英国国际大奖——布克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个韩国小说作品。小说由《素食主义者》、《胎斑》、《树火》三个部分构成，分别以三种不同的视角描述了主人公英惠及其身边亲人的痛苦经历和悲剧命运。细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作品中人物的痛苦经历和悲剧命运来自于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的暴力。事实上，韩江的作品始终关注人的暴力，正如她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我要讨论的话题不止一个，而我最常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的暴力问题。暴力是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如何去接受自己是隐含着暴力因子的人这一事实呢？这种痛苦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Violence and Being Human: A Conversation with Han Kang* 64）。在韩江看来，暴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当我们批判来自他者的暴力时，其实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带有暴力因子的一分子。暴力会带来伤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和化解暴力？人究竟能不能完全消除暴力？这是韩江一直以来苦苦思索的问题，也是她创作的动力与目的之所在。可以说，小说《素食主义者》集中体现了韩江的这种思考和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尔后又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了人性，但是人仍然还保留着其他兽类的特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14）。可见，每个人身上同时拥有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每个人都是善恶并存的生物体，而暴力就是“恶”的一种体现。在现实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之中。因此，人的暴力往往会隐藏在社会的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之中，通过伦理冲突或伦理选择显现出来。韩江在这部作品中，聚焦现代韩国家庭中的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诠释由此引发的亲人之间的家庭暴力，并对家庭暴力环境下人物的伦理选择和伦理悲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来自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家庭暴力

现代韩国社会尽管提倡个体独立、平等、自由的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但由于韩国自古以来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社会和家庭中仍保留着以等级关系和家长制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等级关系和家长制与人的暴力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韩国社会和家庭中的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中必然隐藏着暴力。作品的主人公英惠及其身边的亲人，就生活在保留着这种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韩国普通家庭。仔细阅读《素食主义者》这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主人公英惠及姐姐仁惠是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者，她们既受到来自丈夫的冷暴力、语言暴力和性暴力，也受到来自亲人，尤其是父亲的肢体暴力。这种家庭暴力的产生，其根源就在于现代韩国家庭中仍

保留着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

主人公英惠是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丈夫是一个小公司职员。英惠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少言寡语，不善于与人沟通。婚姻对英惠来说是新生活的开始。她对婚姻生活的期望非常现实，没有一点浪漫的期许，只要夫妻俩能够相敬如宾、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即可。可是，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影响下的夫妻间家庭地位和人格的不平等，给英惠的婚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反映在夫妻关系之中，它虽然并不否认夫妻之情，“但相比之下，它比较重理”，“这‘理’主要是‘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的宗法伦理”（李桂梅，《中西家庭伦理比较研究》39）。在这种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熏陶下，英惠的丈夫就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妻子操持家务的劳动成果——每天早上热腾腾的早餐、熨好的笔挺的衬衫、晚上回家后的丰盛的晚餐、周末躲懒的清闲时光，等等，而他自己却丝毫不愿给妻子最基本的温情与关怀，反而稍不如意就对妻子发牢骚，甚至用刻薄的语言加以斥责。

面对来自丈夫的冷暴力和语言暴力，英惠一直默默地忍受着，直到有一天丈夫的一次习惯性语言暴力，彻底压断了英惠隐忍暴力的最后一根弦。那天早上英惠准备做烤肉，她正在切冻肉的时候，丈夫带着怒气催促道：“该死的，怎么这么磨磨蹭蹭？”（韩江，《素食主义者》22）¹ 每当丈夫一着急，英惠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越想快越是一团乱，在慌乱中英惠握着的刀一下子切到了她另外一只手的手指，“瞬间，刀刃上出现了一抹血痕”（22）。接着在用餐时，裹在烤牛肉中的一小块刀齿，又引来了丈夫新一轮怒吼：“这是什么！不是刀齿吗！吞下去的话该怎么办啊！差点儿就死掉了！”（23）丈夫的这番歇斯底里的埋怨和斥责，终于使英惠陷入了血腥梦魇而不能自拔。第一次做噩梦时，英惠看到了“数百个硕大的、火红色的肉块被系在长长的竹竿上，有些还在滴着鲜血”（14），她还发现了自己的眼睛映在地面的血泊中，闪闪地发出凶残的光芒，而那眼神和表情让她感到非常的陌生和恐惧。从此，英惠拒绝在家里食用动物的肉以及与它有关联的鸡蛋、牛奶等食物，在她看来这些东西都是暴力的牺牲品。英惠的丈夫对英惠的异常举动看在眼里，却始终没有主动地去帮助英惠解开其心结，也从不考虑去找心理医生为她咨询或者治疗。相反，他对在家里不再做带肉的菜和汤的英惠颇有不满，指责她自私、不讲理，并且稍不顺心就一如既往地“对病妻”进行抱怨，甚至不顾因自己身上有一股肉味而拒绝与自己同房的英惠的意志，强行与之发生关系，以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

英惠遭受家庭暴力并非始于她的婚后生活，而是始于她的原生家庭。在既往的生活经验中，英惠长期遭受来自亲人，特别是父亲的暴力伤害。“岳父是个大男子主义者，深具一家之主的威严。他从来不会说关怀人的话

1 文中作品的引文均出自千日的中文翻译版本。以下标出具体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语。……听说老婆的小腿被这样的岳父一直打到十八岁……”（35）在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中，父子辈分之间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主要体现为“父为子纲”，父母在家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他们对子女有绝对的支配和干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要求子女懂事、顺从，否则以严厉的话语批评子女，甚至用肢体暴力管教子女，给子女施加精神压力（王锋等，《家庭负性事件多维度成因及伦理反思》51）。从英惠丈夫的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英惠的父亲在家中具有不可忤逆的绝对权威，且平时对子女严加管教。在这样的家庭伦理环境下，英惠作为一个做事“一根筋”的单纯的孩子，经常招来父亲的肢体暴力。不仅如此，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弟弟英豪也动不动用“欺负村里其他孩子的方式”（190）欺负姐姐英惠。英惠在亲人的暴力伤害下，从小就变得少言寡语、不善言辞。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英惠长大成人、嫁为人妇之后，父亲和弟弟对英惠的暴力倾向也没有消失。在仁惠的新家给母亲过生日的家庭聚会上，英惠的父亲就因为英惠拒绝肉食而对她进行粗暴的干涉。面对顽强抵抗的英惠，他依旧使用肢体暴力来进行管教。而一旁的弟弟要不是被自己的妻子所阻拦，也早就上去对姐姐英惠实施暴力。

不管是英惠的丈夫对英惠的冷暴力、语言暴力和性暴力，还是英惠的亲人，特别是父亲对英惠的肢体暴力，它们归根结底均源于“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在这种传统的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中，作为子女接受父亲的肢体管教，或者作为妻子对丈夫无条件顺从，都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在英惠的成长过程中，她的母亲和姐姐则一直践行着这种传统伦理，而且英惠成家之后，这种现状也没有得到改变。当英惠的丈夫把英惠拒绝肉食的事情告诉给英惠的母亲和姐姐时，她们均对英惠的丈夫表示由衷的歉意，英惠的母亲甚至对女婿说：“真是没脸见你啊”（31）。但是，对从小饱受家庭暴力的伤害、婚后希望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新生活的英惠而言，这种在丈夫和亲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日常伦理行为却是令人不堪忍受的精神枷锁。

更加令人痛苦的是，来自传统伦理秩序和伦理观念的他者暴力，又唤起了英惠对自身暴力的记忆，从而使她陷入更加恐怖的血腥梦魇之中。幼时的英惠曾被家中所养的小狗小白咬伤，父亲暴怒之下把小白绑在摩托车后活活拖死以示惩罚，而年幼的英惠见证了这一施暴的全过程。“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望着筋疲力尽的、喘着粗气翻着白眼的小白。每当跟那家伙闪烁着的眼神碰撞的时候，我就横眉竖眼盯着它。你这条恶狗，居然咬我？”（50）英惠的这种报复心理，使她加入了对小白的施暴者行列。那天，英惠用狗肉汤拌饭吃了满满一大碗，而在那天之前，小白还是以机灵懂事著称的家犬——英惠的小玩伴。英惠在意识到自己的暴力行径后，小白那“吐着冒着泡的鲜血，边跑边望着我的眼睛”（51），成为了她挥之不去的血腥梦魇。“一个个短暂的梦境接连不

断地扑过来。先是动物闪烁着的眼睛，继而是流淌着的鲜血，被挖开的头盖骨，然后又是猛兽的眼睛，它像是从我肚子里浮上来一样”（39）。这些像是从肚子里浮上来的眼睛也许是小白，也许是“我”曾经吞入肚中的各种动物的肉块，也许是“我”在生活中无意间施以暴力的对象。“我”作为施暴者令英惠感到害怕，“每次浑身哆嗦着睁开眼睛后，我就无法控制地检查自己的双手，确认指甲是否还柔软，牙齿是否还温顺”（39）。来自传统伦理秩序和伦理观念的他者暴力，以及由此引发的英惠对自身暴力的觉醒，使她时常受到血腥梦魇的折磨，让她终日处在无尽的焦虑与恐慌之中，加上丈夫对她的一贯冷漠和最终的离弃，为她日后作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埋下了伏笔。

跟英惠一样，仁惠在成长过程中也一直生活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下，但与做事“一根筋”的单纯的英惠相比，她表现得更为懂事一些。仁惠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始终小心翼翼地应对着父亲的暴力，并且以孝顺父母、照顾弟妹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努力扮演好女儿、好姐姐的角色。直到英惠出现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在试图理解妹妹内心世界的过程中，她才清晰地发现自己同样伤痕累累的内心，并终于明白“那时自己作为长女所表现出来的懂事，并不是什么早熟，而是一种怯懦，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方式而已”（190）。

除了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以外，极度孤独的丧偶式婚姻也给仁惠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仁惠十九岁离开老家到首尔，独自闯荡，白手起家，经营起一间小具规模的化妆品店，个中辛酸，只有她自己体会最深。或许是因为在丈夫疲惫的模样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或许是因为婆家多数人从事教师和医生职业的家庭氛围满足了自身的某种缺憾，仁惠选择了和这个男人结婚。婚后的仁惠继续经营着化妆品店，负责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作为妻子，仁惠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打理得非常不错，以致于让英惠的丈夫对姐夫好生羡慕：“我很羡慕姐夫。他虽然是美术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对家计没什么帮助。虽然有些遗产，但是不挣钱的话总会有坐吃山空的一天。多亏大姨子努力工作，姐夫这辈子都可以安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艺术创作”（40-41）。但是，引发英惠丈夫“羡慕”的仁惠丈夫的婚姻生活，只是别人眼里的表面风光而已，实际上它与仁惠丈夫的内心感受相去甚远。仁惠的丈夫性格温和，不会像妹夫那样稍不顺心就呵斥妻子，但他骨子里还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夫为妻纲”的传统伦理观念。在仁惠的家里，仁惠丈夫的经济能力与传统的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不相符合，这种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下的“伦理错位”，让他时常感到自卑和压抑。为了消解心中挥之不去的压抑，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并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由于他终日沉醉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之中，所以在家庭生活中总是呈现出日常性缺席的状态。面对令人郁闷的丧偶式的婚姻生活，仁惠曾想过逃离，但她终究还是留下来继续尽自己作为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她在无数个孤独的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默默地忍受着寂寞和痛苦，直到发现丈夫和妹妹英惠之间发生乱伦行为后，

她才彻底结束令人不堪回首的婚姻生活。

二、家庭暴力环境下的伦理选择与伦理悲剧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主人公英惠和姐姐仁惠所处的家庭暴力环境，实际上是她们所面临的家庭伦理困境。对她们来说，要应对和化解自己面临的家庭伦理困境，或者从自己面临的家庭伦理困境中解脱出来，就必须作出相应的伦理选择。在作品中，英惠和仁惠针对自己所面临的家庭伦理困境，都以各自的方式做出了相应的伦理选择。然而，由于她们的伦理选择均受制于非理性意志，所以无一例外地以悲剧收场。

小时候，面对父亲严厉的暴力管教，英惠只能采取隐忍或略带叛逆的逃避的方式来应对。在姐妹俩还小的时候，她们曾经历过一次迷路，当时只有九岁的英惠对姐姐仁惠说：“咱索性别回家了”（190）。这表明在英惠幼小的心里已经滋生出叛逆和逃避的种子。英惠在原生家庭暴力环境下养成的这种对暴力的应对方式，延续到了她婚后的生活。面对来自丈夫的冷暴力和语言暴力，英惠一开始以隐忍的方式来应对，而自从陷入可怕的血腥梦魇而不能自拔之后，则开始采用叛逆和逃避的方式来应对。第一次做血腥噩梦时，英惠发现自己的眼睛映在地面的血泊中，闪闪地发出凶残的光芒，而那眼神和表情让她感到非常陌生和恐惧。为了摆脱血腥噩梦带来的困扰，第二天一早，她便把家中冰箱里的各种肉食以及鸡蛋、牛奶等相关食物统统扔进了垃圾袋中，从那以后便在家里以素食来替代肉食，并且嫌丈夫身上有股肉味而拒绝与之同房。不仅如此，在姐姐仁惠的新家给母亲过生日的家庭聚会上，她面对父亲对自己拒绝肉食的粗暴干涉，在家人面前以割脉自杀的极端方式表示抗议。

但是，在丈夫的一贯冷漠和父亲一如既往的肢体暴力面前，英惠所采取的带有叛逆性和逃避性的伦理选择却无济于事，它不仅没有能够化解英惠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反而使她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暴力因子，从此陷入更加恐怖的血腥噩梦之中。随着英惠心理疾病的不断恶化，梦境中出现的英惠自身的暴力也变得越来越血腥：“在梦中，我用刀砍别人的头颅，因没有砍断而拽住长发再次下刀……”（38）更加糟糕的是，伴随着血腥梦魇的不断侵扰，那些存在于梦境中的邪恶欲望还顺着英惠的大脑延续到了清醒后的现实中：

“从这些噩梦中惊醒之后，清醒时也想杀死那些一颠一颠地走在前面的鸽子，想勒死观察过好久的邻居家小猫咪”（38-39）。现实中的这些邪恶念头使得英惠双腿发颤、冷汗直流，并且为自己仿佛成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感到恐惧和不安。经过长时间刻骨铭心的焦虑不安的精神痛苦，英惠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一直想要摆脱的暴力其实是自己身体中的一部分。于是，她决定彻底抛弃作为人的自己，努力使自己变成没有暴力的植物——一棵树，并从中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英惠的这一决定，不仅意味着她对人类群体的脱离，而且意味

着她抛弃作为人的伦理意识。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伦理意识”（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7）。显然，英惠抛弃作为人的伦理意识而努力成为一棵树的行为，是她彻底逃避自己所面临的伦理困境的一种伦理选择，而这种伦理选择不仅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进程，而且导致了原本薄弱的理性意志彻底失去了对她自由意志的控制。

英惠自从决定成为一颗树以后，天天沉浸在对植物的幻想之中，而非常巧妙的是，她的这种伦理选择正好迎合了姐夫的一个创作灵感。英惠的姐夫是一个普通的影像作家。在婚后很长一段日子里，他的影像作品呈现的都是十分现实的东西，其中汇集了各种带有暴力的影像，比如广告、新闻报道、政客的嘴脸、坍塌的桥梁和百货商店，还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以及身患绝症、正在哭泣的孩子，等等。可是，自从经历了那次家庭聚会上父亲和英惠之间的暴力冲突后，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当时，他看到英惠的手腕上喷出鲜血，便毫不迟疑地冲上去，一把背起英惠去医院进行了救治。从那以后，他就试图创作不涉暴力的纯粹的影像画面。在一次与妻子不经意的交谈中，英惠的姐夫偶然得知英惠身上还留有胎斑的事实。那一刻，“她不吃肉——只吃谷物、野菜和蔬菜的事与那个像绿叶一样的斑点在他心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那天从她的动脉中喷薄而出的鲜血浸湿他白衬衣的情景，让他感到像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带有冲击力的暗示”（86-87）。从此，“小姨子的臀部尚留有胎斑的事实和身上彩绘着花朵的全裸男女交合的场景，不可思议地构成一个准确而清晰的链接，镌刻在他的脑海里”（71-72）。他在脑海中不断地想象着从未见过的英惠的裸体，开始在素描本中描画自己梦想中的画面：身上画满鲜花的英惠和自己交合着，肉体忘我地沉浸在其中。针对自己的这种创作灵感，他曾经拷问过自己：“我是正常人吗？我是一个有足够道德感的人吗？”（73）他也曾经苦苦寻找从这个画面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但没有能做到。“解脱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这个欲望”（93）。

当姐夫要求英惠担任他的影像模特时，英惠欣然表示同意，因为姐夫的创作灵感与她想要摆脱人类的伦理身份成为一棵树的伦理诉求相吻合。英惠在为姐夫担任影像模特时，非常享受颜料在自己身上开出花朵的过程。拍摄结束后，她也继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身上的花叶，这些花叶让她感到格外的安心，也让她不再做那些可怕的噩梦。在帮助姐夫创作影像作品的过程中，身上的植物所带来的安定感和舒适感，让英惠很自然地接受了同样身上画满花朵枝叶的姐夫的肉体。英惠与姐夫的交合，对她而言只是出于对植物的强烈渴望。当身上没有画满花朵枝叶的姐夫要求与她交合时，英惠曾果断地拒绝过，因为只有那布满花叶的躯体才能激起她与之拥抱、交融的欲望。可以说，英惠和姐夫的乱伦交合，是她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彻底抛弃作为人的伦理意识，幻想成为一棵树的终极伦理选择。英惠和姐夫的乱伦交合，不管是出

于何种目的或者是在何种情况下发生，都是触犯人类最基本的伦理禁忌的不道德的伦理选择，其结果是造成令人痛心的家庭伦理悲剧。

与英惠略带叛逆的逃避性伦理选择不同，仁惠应对家庭暴力的伦理选择是无条件的隐忍和付出，这是她从小在原生家庭的暴力环境中养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仁惠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总是以符合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行为准则来约束自己，时刻保持虔诚愉悦的态度，努力使父母安心和顺心。她在小时候领着九岁的英惠迷路时，并没有听取英惠“借机离家出走”的建议，带着妹妹安全地回到了家。她虽然目睹着、亲历着父亲的暴力，但对于她来说，那是无论如何也必须回去的家。“在家从父”的传统伦理观念使她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带着妹妹顺利找到回家的路。仁惠由于从小养成了这种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所以婚后面对来自丈夫的冷暴力，她也从未主动地向丈夫表达自己的情感诉求或伦理诉求，只是默默地尽作为一个妻子的本分，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面对令人压抑的丧偶式婚姻生活，她曾想过逃离，但终究还是留下来继续尽自己作为妻子的责任和义务，一如既往地靠自己的双手把家里的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且始终不忘孝敬父母、关照患有精神障碍的妹妹英惠。

毫无疑问，仁惠的这种在外人看来值得称道的伦理选择，是以她默默地忍受无数个孤独之夜的寂寞和痛苦作为代价的。但令人可悲的是，仁惠为丈夫和家庭付出的痛苦代价，并没有换来她所期望的回报。仁惠对丈夫的无条件隐忍和付出，不仅没有打动一贯冷漠的丈夫的心，反而让丈夫感到更加压抑甚至窒息，以致让他变得更加自私和不负责任：“老婆的忍耐和善意令我窒息，使我变得更坏”（117）。可以说，仁惠对丈夫的无条件隐忍和付出，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丈夫错误的伦理选择，而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当她看到丈夫和英惠做出冲破伦理底线的乱伦行为后，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于是就义无反顾地祭出了自己的终极伦理选择——与丈夫分道扬镳，把英惠送进精神医院，让她在成为一棵树的幻觉中走向生命的尽头。仁惠所作出的这一终极伦理选择，使一家人彻底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家庭伦理悲剧。

三、对家庭暴力的伦理反思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意识和理性意志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之后，人才能通过理性意志控制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15）。可见，暴力的产生与人的伦理意识和理性意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仔细阅读《素食主义者》这部小说，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还是受害者，他们或者因为深受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影响，或者因为受到来自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家庭暴力伤害，在亲情伦理意识和理性意志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就是导致英惠一家家庭暴力和

家庭伦理悲剧的主要原因。

在作品中，英惠的父亲和丈夫以及仁惠的丈夫是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他们作为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维护者与践行者，亲情伦理意识淡薄，缺乏理性意志。英惠的父亲是一个在家享有绝对权威的大家长，他“从来不会说关怀人的话语”（35）。在英惠父亲的眼里子女并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只是家庭的“附属品”。因此，他很少关注子女的情感需求和伦理需要，只是一味地要求子女懂事和顺从，如不服从，会以刻薄的语言加以斥责，或者用肢体暴力加以管制，即便是对已经有了自己独立家庭的英惠，也不停止暴力干涉。英惠的父亲又是一个男尊女卑观念非常浓厚的家长，他不仅纵容儿子从小用暴力欺负姐姐英惠，而且得知英惠拒绝肉食而给女婿的生活带来不便时，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趁家庭聚会之机来到首尔，以呵斥、强行塞肉、打耳光等暴力手段逼迫英惠就范。英惠父亲用暴力管教子女时，从来不问缘由，从来不分是非，只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或非理性意志行事。英惠的姐姐仁惠在小时候比“一根筋”的英惠表现得更加“懂事”一些，所以很少遭到父亲的肢体暴力，但在家庭暴力环境下所受到的精神伤害同样使她的内心变得伤痕累累。她在回顾自己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时，曾感叹自己作为长女所表现出来的“懂事”，其实是“一种怯懦，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方式而已”（190）。在英惠的父亲身上，我们很难看到家长对子女呵护有加、教导有方的亲情伦理意识，看到的只是自由意志或非理性意志驱使下的对子女的暴力管教。英惠父亲的这种不讲亲情、只讲父权和男权的传统伦理观念以及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给英惠和仁惠的亲情伦理意识和理性意志的成长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英惠的丈夫是一个男权观念非常浓厚的家长，他始终固守并奉行着“夫为妻纲”的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他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为自己着想，稍有不顺就对妻子发牢骚甚至加以斥责。他从来没有主动去了解英惠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需求，反而一味地要求英惠对自己百依百顺。因此，当英惠在心理上出现异常情况时，他便突然意识到：“对眼前的这个女人，自己竟一无所知”（18）。英惠丈夫的这种淡薄的亲情伦理意识，在英惠身上出现异常情况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面对心理出现异常情况的英惠，他不仅没有去帮助她解开心结，也从不考虑去找心理医生为她咨询或者治疗。相反，他对英惠拒绝肉食的行为深感不满，一如既往地“对病妻”施加冷暴力和语言暴力，甚至每次参加饭局晚归的夜里，他都会仗着酒劲强行与英惠发生关系，以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当我死死按住她不断反抗的胳膊并褪下她的裤子时，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喷涌上来。我低声谩骂着拼命挣扎的老婆，三次中总会有一次能成功”（36）。事实上，英惠的丈夫从未把英惠当做同甘共苦的人生伴侣，而“只当是个能为你做饭、打扫房间的姐姐或钟点工”（36）。在英惠丈夫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对妻子的关爱和包容，也看不到对妻子人格的最起码的

尊重，看到的只是对自己私欲的追求，以及对妻子失去理性的暴力压迫。

无独有偶，仁惠的丈夫也是一个骨子里充满了大男子主义传统伦理观念的家长。他作为一家之主，却不能挣钱养家，这种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下的“伦理错位”，让他时常感到自卑和压抑。为了消解心中挥之不去的郁闷，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结婚后第一次去观看丈夫的作品展示会时，仁惠着实被丈夫身上呈现出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所惊讶，“她不敢相信他会有如此高的工作热情。他那些充满热情的作品和像困在水族馆里的小鱼一样的日常生活，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160）。仁惠对丈夫的惊讶和慨叹，很好地说明了仁惠的丈夫对待工作和家庭的截然不同的伦理态度。他从来不顾家庭，终日沉醉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之中，留给妻子的只是充满孤独和寂寞的丧偶式婚姻生活。“他始终为自己的工作忙碌着，偶尔在家的时候则像投宿客一样让人感到陌生。尤其是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沉默像橡胶一样韧劲十足，又像岩石一样无比沉重”（159）。仁惠的丈夫把自己当做“投宿客”的行为，和英惠的丈夫把英惠当做“钟点工”的行为一样，也是亲情伦理意识极度淡薄的一种表现。仁惠的丈夫对妻子的无条件的隐忍和付出，“不是不知道这是老婆善良而软弱的一面，是在为理解和关怀对方而做出的最大努力”（117），但为了保护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他不仅没有对妻子心怀感激，反而变得越来越自私和不负责任，以致在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与英惠发生乱伦行为，触犯婚姻伦理大忌，给仁惠和仁惠的父母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

毋庸置疑，英惠一家的家庭暴力来自于英惠的丈夫和父亲以及仁惠的丈夫，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影响下亲情伦理意识的淡薄和理性意志的缺失，使他们成为了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但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英惠和仁惠身上存在的缺陷——扭曲的亲情伦理意识和薄弱的理性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对英惠一家家庭暴力和家庭伦理悲剧的产生起到了助推作用。英惠和仁惠身上存在的这种缺陷，与她们成长的伦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们从小在家庭暴力环境下长大，缺乏来自父母的亲情伦理教诲，这导致她们无法树立正确的亲情伦理意识。在她们看来亲情伦理无非就是“子女顺从父母”、“妻子顺从丈夫”。在这种扭曲的亲情伦理意识的支配下，她们在原生家庭中无条件地顺从父母，结婚以后则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的日常生活，从来不为自己着想。不仅如此，小时候父亲一味地要求她们听话和懂事，如不服从便加以暴力管教，而这种来自家长的“听话”教育，严重阻碍了她们理性意志的成长，导致她们不善于理性思考，不善于判断是非，更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诉求和伦理诉求。英惠和仁惠在婚后生活中所作出的一系列伦理选择，归根结底皆源于她们的这种扭曲的亲情伦理意识和薄弱的理性意志。

英惠在结婚以后，在家尽心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希望过一种平平安安的生活。但是，她身上的扭曲的亲情伦理意识严重阻碍她和丈夫的情感交流，

“老婆少言寡语，很少主动跟我要什么东西，即使我晚上回家晚了，她也不会管我。难得在一起的公休日，她也没有提过要一起外出之类的要求。一整个下午，我手里握着遥控器在客厅里打滚，她也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闭门不出”（4-5）。英惠以为尽力满足丈夫的物质要求和生理需求，就算尽了做妻子的本分，殊不知和丈夫的情感交流或对丈夫正当的伦理诉求，对建立夫妻间健康的亲情伦理有多么重要。不仅如此，当来自传统的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他者暴力以及对自身暴力的觉醒，使她陷入血腥梦魇而不能自拔时，她也没有冷静地去思考和寻找应对或化解这种伦理困境的有效方法，而是以消极的叛逆和逃避一以贯之，体现出她身上的薄弱的理性意志。英惠面对家庭暴力所采取的一系列伦理选择——拒绝肉食、拒绝与丈夫同房、割腕自杀以及抛弃作为人的伦理意识而努力成为一棵树，等等，不仅没有使她从伦理困境中解脱出来，反而让她也变成了“施暴者”，给包括父亲和丈夫在内的亲人造成了暴力伤害。而她在努力成为一棵树的过程中与姐夫发生的乱伦行为，更是给姐姐和父母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打击。从此，姐姐精心守护的小家庭不复存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变得疏远：“突然衰老的父母不愿再看到英惠，也没再联系一看到就能联想起禽兽不如的女婿的仁惠”（168）。

婚后的仁惠尽管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但她始终任劳任怨，全心全意照顾丈夫的日常生活。但是，她和英惠一样也只是致力于满足丈夫的物质要求和生理需求，而从来没有主动地去了解丈夫的内心世界，与丈夫进行夫妻间应有的情感交流。仁惠面对来自丈夫的冷漠，曾经反问过自己：“一起生活的这八年间，正如他折磨自己一样，自己是不是也让他饱受摧折呢？”（192），但她始终没有与丈夫进行开诚布公的心灵对话。面对由丈夫的冷漠造成的伦理困境，仁惠既没有认真思考应对或化解的方法，也没有勇气向丈夫表达自己的情感诉求或伦理诉求，只是以无条件的隐忍和顺从来应对。仁惠的这种伦理选择不仅没能化解来自丈夫的冷暴力，反而让丈夫感到非常郁闷：“如此轻易地放弃，又将这种放弃变成抑郁，然后再沉淀在内心的性格，压抑得他无法呼吸”（117）。事实上，仁惠的丈夫是希望仁惠对他的冷漠和自私提出质疑的，从而缓解自己对仁惠的愧疚之感：“如果老婆像别人家的老婆那样歇斯底里、大发雷霆、喋喋不休、骂他个狗血淋头，他的心里可能会好受些”（117）。在某种意义上，仁惠对丈夫的无条件的隐忍和顺从，是对丈夫的一种变相的“冷暴力”，正是这种“冷暴力”使仁惠和丈夫之间的情感鸿沟变得越来越深，以致间接地把丈夫推向触犯伦理禁忌的深渊。仁惠的扭曲的亲情伦理意识和薄弱的理性意志，也体现在她对英惠所采取的终极伦理选择上。仁惠从小就把英惠当作自己照顾和保护的对象，但丈夫和英惠之间发生乱伦行为之后，她明明知道英惠是被动的，却毅然决然地把患有精神障碍的英惠送进精神医院，不再给予亲人的关怀。当她走进病房把英惠的行李包放下的瞬间，“之前没有意识到的罪恶感突然像一个死结一般压在了

她的胸口”（173），但她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不要心软，英惠不是你自己所能背负的，不会有人指责你，你能扛到现在已经很好了”（173）。

如上所述，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影响下施暴者亲情伦理意识的淡薄和理性意志的缺失，以及受害者亲情伦理意识的扭曲和理性意志的薄弱，是导致英惠一家家庭暴力和家庭伦理悲剧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尽管这两个原因在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不得不说它们合力造成了英惠一家的家庭暴力和家庭伦理悲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阻止或化解这种家庭暴力，从而避免类似家庭伦理悲剧的发生呢？

在作品中，作者对此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我们通过小说对主要人物命运的描写，能够体会到作者为如何化解来自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家庭暴力所作的深切思考，而仁惠在整个家庭遭到伦理悲剧后所发出的一连串哭诉，则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思考：“难道那天不能阻止爸爸动手吗？不能阻止英惠拿刀割腕吗？不能阻止老公背起流血的英惠跑去医院吗？不能阻止妹夫无情地抛弃从精神医院出院回家的英惠吗？还有，不能挽回老公在英惠身上所做的，已经不想再回忆的，早已成为街头巷尾廉价丑闻的那件事吗？不能阻止自己身边所有人的人生轰然倒塌的局面的发生吗？”（164-165）。仁惠的这番哭诉是一个家庭暴力受害者发自肺腑的悔悟，也是在经历了痛苦的家庭伦理悲剧后的一种觉醒，从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作品所要表达的伦理教诲。来自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家庭暴力，是由施暴者和受害者合力造成的结果。要想消除这种家庭暴力，不管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因为深受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影响，意识不到自己在有意无意间说出的话或做出的行为，对亲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暴力伤害，甚至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与其指望他们自觉地从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中觉醒过来，不如由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主动出击，去阻止或化解来自施暴者的家庭暴力。要想做到这一点，作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英惠和仁惠们，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亲情伦理意识，学会理性思考，培养理性意志。面对来自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家庭暴力，要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暴力，要多思考应该怎样阻止或化解这种暴力，而不是选择逃避或者无条件的顺从和付出。更重要的是，在树立正确的亲情伦理意识、学会理性思考、培养理性意志的同时，还要学会敢于向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表达自己的情感诉求和伦理诉求，促使他们反省自己的暴力行为，唤醒他们应有的亲情伦理意识和理性意志，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从而阻止或化解来自传统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的家庭暴力，避免由此引发的家庭伦理悲剧的发生。

Works Cited

韩江：《素食主义者》，千日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

[Han Kang. *The Vegetarian*. Trans. Qian Ri.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13].

Krys Lee. "Violence and Being Human: A Conversation with Han Kang." *World Literature Today* 90.3/4 (2016): 62-66.

李桂梅：《中西家庭伦理比较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Li Guimei. *Chinese and Western Family Ethics: A Comparative Study*. Changsha: Hunan UP, 200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Beijing UP, 201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6（2015）：10-19。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Expos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6 (2015): 10-19].

王锋等：“家庭负性事件多维度成因及伦理反思”，《大庆社会科学》4（2020）：50-53。

[Wang Feng. "Multi-Dimensional Causes of Negative Domestic Events and Their Ethical Reflections." *Daqing Social Sciences* 4 (2020): 50-53].